

大变局下国际思潮新动向与 中国外交应对^{*}

□ 卢 静 林怡婷

〔提 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旧观念与各种新思想碰撞交锋，国际思潮呈现一些新特点和趋势：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角力，发展型区域主义兴起；保守主义思想回归，国际竞争与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多边主义陷入话语竞争，国际旧秩序与新规则平行共存；全球议题“泛安全化”，国际安全赤字加重。身处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既深受国际思潮的影响，也是塑造国际思潮的重要力量。国际思潮新动向给中国外交既带来严峻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提升对国际思潮的引领力；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协调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关 键 词〕国际思潮、中国外交、世界大变局

〔作者简介〕卢 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林怡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1 期 0028-19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项目“世界大变局下国际思潮的新动向”（项目编号：3162024ZYKA03）的阶段性成果。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经历深刻变革和重塑，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乌克兰危机延宕，巴以冲突不断升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交织，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日益加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大变局下，传统旧观念与各种新思想碰撞交锋，国际思潮呈现一些新特点和趋势。国际思潮新动向给中国外交既带来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中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作出更大贡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角力， 发展型区域主义兴起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以及信息技术革命、自由市场体制的推广，经济全球化获得了迅猛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市场的力量向全球推广其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政策实践，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社会规范、组织结构、政治制度的越境扩散，并带来各种思想观念的全球性交流、交融甚至碰撞。因此，全球化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1]如今，全球化已经渗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成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因素。它促进了全球的互联互通，使世界“时空压缩”并“结构化”为一个整体，同时也产生了世界各国之间及国家内部相对收益的不均衡性，从而不时触发针对全球化的反制力量。全球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充斥着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倾向的话语场域和“思想的‘游

[1]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

戏地带’ ”。^[1]对此,有人指出,全球化既是“陈词滥调”,又是“一句神奇的口头禅”,还是“一把意在打开通往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2]

全球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反全球化力量。作为一种与全球化相对的行为、思想和情绪,反全球化思潮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特点。反全球化既可以指对全球化的违背、破坏,或是反对、抗议;也可以指对全球化的反省、怀疑,亦可以指对全球化不满的情绪和态度。反全球化甚至被视为“另一种全球化”。^[3]1999年的西雅图事件被视为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标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声音高涨。2016年西方民粹主义崛起后,曾经主导全球化的美欧等西方国家公然转向反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强势来袭。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新一轮反全球化与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等极端保守主义思潮深度合流,进一步放大了民族自治和自由市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反全球化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驱使下,国家的发展过于依赖自由市场的全球扩张并受制于诸多国际制度的约束,这未能给本国带来持续的经济繁荣,反而严重加剧国家及其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还在其内部造成了难以调和的社会政治危机。同时,在全球战略竞争愈加激烈、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全球性危机频发的复杂国际环境面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显得愈发脆弱。因此,新一轮反全球化思潮主张国家应从全球化及相关国际制度的制约中“夺回主权”,有针对性地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与政治组织的干预和管制,尤其要降低对特定国家的经济依赖,推动本国对外经济关系与全球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冲击,反全球化思潮在西方乃至全球的保守主义政府与民粹主义政党及选民中引发强烈共鸣。

然而,反全球化不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良策。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反全球化思潮驱动下采取的“去全球化”政策,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不安。在全球经

[1] 罗兰·罗伯逊:《为全球化定位:全球化作为中心概念》,载梁晨主编:《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2]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3] 李丹:《反全球化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第63页。

济方面，国家单边追求“去全球化”产生了多重负面影响：通货膨胀加剧、劳动力短缺、供应链成本提高、全球金融体系受到冲击，^[1]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和长期发展。在国际政治层面，“去全球化”往往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策略工具，削弱经济相互依赖对地缘政治冲突的缓冲作用，并导致国家以“符合其新的地缘政治承诺”为基准调整政策，^[2]甚至“逐渐从软制衡转向使用更强硬的权力政治工具”^[3]。在政治文化层面，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思潮与其历来笃行的所谓自由、民主、开放价值观形成对立，严重挑战其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体系，危及其大国形象和维系秩序的合法性权威。在此形势下，不少西方人士开始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提出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引导世界回归“嵌入式自由主义”，^[4]重返传统的以“自由贸易、民主政治、国际机构与制度”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并通过促进内部公平的改革来化解相对收益不平衡导致的国内危机，^[5]呼吁“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构建全球化以减轻其负面影响，同时确保其促进增长的核心动力完好无损”^[6]，创造“后新自由主义的再全球化”^[7]。由此可见，这股反思全球化和批判反全球化的声音，既对西方反全球化思潮形成抗衡，也推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化。

[1] Alden Edward, “The Dangerous New Anti-Globalization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May 3,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5/03/globalization-deglobalization-inflation-economy-trade-borders/>.

[2] Prasad Eswar, “Zero-Sum Game: Shockwaves Have Shredded the Globalization Script, with Profound Consequences for Poorer Countries,” *Foreign Policy*, April 1, 2023, pp.42-4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3/24/trade-economy-globalization-united-states-china-ira-chips-reshoring-decoupling-industry-china/>.

[3] Norrin M Ripsman,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5, 2021, pp.1317-1333.

[4] Louis Matthew Bishop and Anthony Payne,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fferent Globalizations: Theorizing Re-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Vol.18, No.1, 2021, pp.1-21.

[5] T. V. Paul,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Re-globalization: Adapt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5, 2021, pp.1599-1620.

[6] Sinan Ülgen,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 in Sinan Ülgen et al., *Rewiring Globalization*, February 17, 2022, p.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2/02/rewiring-globalization?lang=en>.

[7] Louis Matthew Bishop and Anthony Payne,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fferent Globalizations: Theorizing Re-globalization,” pp.12-16.

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角力中，发展型区域主义兴起，成为重塑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力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区域化作为全球化的一股共生力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一个永久和突出的特征”^[1]。区域主义既能帮助国家顺应全球化趋势保持开放，又为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危机时“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2]。在国际战略竞争加剧和全球化动力不足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加强区域合作，并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及其所在区域的影响力来应对全球化失序和全球性问题，这进一步助推了区域主义的盛行，“区域化”甚至被认为是可能“取代全球化成为主导经济秩序”的力量。^[3]在区域主义浪潮中，一种基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发展型区域主义”（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兴起。发展型区域主义是指各类行为体（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为谋求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采取的一致性行动。^[4]发展型区域主义强调通过配置或重新规划特定的跨国空间来整合区域资源，推进单独行动无法实现的发展目标，^[5]以期在缓冲全球化危机时谋求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参与全球市场经济并积极提高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6]发展型区域主义兼具市场化驱动、主权国家干预和区域公共产品导向的特点，旨在促成“以推动成员国经济结构转型为中心”、符合成员国“长期、战略性的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7]并注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式帮助

[1] George Joffé, “Regionalism – A New Paradigm?,” in Telò Mario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Competing Reg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3rd editi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xvi.

[2] 王栋、李安迪：《论百年变局下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新发展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 年第 4 期，第 26 页。

[3] Rana Foroohar, “After Neoliberalism: All Economics Is Loc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2, pp.134-14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fter-neoliberalism-all-economics-is-local-rana-foroohar>.

[4] 崔庭赫、郑先武：《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亚发展区域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70 页。

[5] Helen Nesadurai,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 in Deciancio Melisa, Nemiña Pablo and Tussie Diana eds.,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p.76.

[6] 崔庭赫、郑先武：《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第 76 页。

[7] 《分裂世界中的发展前景：全球失序与区域应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2022 年 6 月 27 日，第 114 页，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2022_ch.pdf。

提升成员国的发展能力。^[1] 发展型区域主义在区域空间设置和制度化方面更具包容度和灵活性，能够为成员国达成共识提供协调空间，与成员国所参与的国际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同时对发达国家的加入持开放态度。因此，发展型区域主义是一种更具包容性、平等性与普惠性的区域合作模式。亚非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和区域发展目标都在积极探索不同的发展型区域主义模式，增强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和失序的发展韧性。

综上所述，反全球化思潮的盛行，没有也不能中断全球化进程。在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思和对反全球化的批判中，发展型区域主义的兴起推动世界进入新的“再全球化”进程。

二、保守主义思想回归， 国际竞争与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保守主义是一种捍卫传统、警惕激进变革、强调既有价值和现状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者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条系统”，而是往往“根据时代的状况重新表述他们的信念”。^[2] 通常来看，保守主义是对“害怕习以为常的社会将不复存在”而作出的一种反应，因此具有工具性和历史情境性的特点。^[3] 这也使得“在任何时候，欲恰当地描述保守主义的立场，都要视现行发展趋势的方向而定”，^[4] 要正确理解保守主义的内涵，也要由具体的现实情境而定。

在西方国家，保守主义在与自由主义既对立又融合的过程中发展演变。传统保守主义集中于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批评，强调要重视宗教与客观道

[1] Helen Nesadurai,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 p.83.

[2] 拉塞尔·柯克：《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张大军译，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3] Samuel P. Huntington, “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1, No.2, June 1957, pp.454-473.

[4]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0页。

德戒律、珍视传统价值与审慎精神、拥护自由及私有财产、突出社会等级秩序、重视民族主义和警惕国际主义等。随着自由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传统保守主义逐步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建制思想，也充分吸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观、民主国家政体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使之成为自身重要的当代内涵。据此，二战后兴起的保守主义要求在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重塑放松管制、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团结国内传统主义、宗教右派、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等不同派别的保守力量，通过凝聚捍卫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重塑了一股实力强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1]21世纪初，美国小布什政府出台强势的新保守主义全球战略，积极推动自由民主制度输出与自由市场全球化，运用军事力量及“先发制人”战略打击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国家，再次将新保守主义推向了高潮。在这一阶段，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包括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观、自由民主体制的优越信念、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及维护霸权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至上，具体表现为依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共识，以强硬和保守的国际主义路线推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随着苏联解体、反恐战争的落幕及内部分歧扩大，新保守主义阵营因失去共同敌人并缺乏有力的领导者而瓦解分化，退居相对守势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被冠以“保守”之名，这一阶段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极具扩张性。西方国家在新保守主义的驱使下通过“华盛顿共识”重塑世界主流发展理念，将新自由主义模式推至全球，塑造并巩固了以经济全球化、民主政治体制和多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搁置政治分歧、推动国际合作的政治氛围中，多数国家主动融入这一国际秩序以谋求发展。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发展观和治理观得以广泛传播，甚至在部分地区形成了具有超国家倾向的世界主义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

然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警惕自由主义的传统保守力

[1] 徐丽娜、姚寰宇：《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现状及困境》，《美国研究》2023年第2期，第103-104页。

量始终存在。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时期，他们多为国家内部中下阶层的普通民众，承担着新自由主义模式日渐失衡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认为国家过度重视国际事务而忽视国民处境，不满全球化浪潮对其传统价值观和国民身份的威胁和侵蚀。在西方社会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持续低迷的经济导致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愈发匮乏，加剧主流白人社群和蓝领阶层在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和在社会文化方面反移民、反多元的仇外情绪，阶层矛盾和身份认同危机逐渐成为社会分化根源。^[1]在此形势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自由国际主义逐渐成为保守主义新的攻击对象。一种主张本土意识、回归民族精神及重视国家利益的保守观念在西方国家内部迅速升温，并以右翼民粹主义的形式急剧回潮，自下而上地促使政府向右倾保守的方向转变。保守派精英和右翼政党将本国普通民众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政治诉求作为拉拢民粹民族主义选民的叙事工具，重点攻击自由派建制精英垄断国家决策，认为“背信弃义的精英们纵容不值得的外部群体——移民和少数民族——而蔑视国家真正的人民”^[2]。他们在掌权后又采取了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摒弃自由国际主义精神的外交举措，退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针对特定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有选择地重组同盟伙伴，以此来追求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2016年，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强势崛起的“特朗普主义”就是这一思想趋势的突出案例。尽管执政党轮替影响了部分右倾保守政策的连续性，西方国家的保守主义仍在国际层面产生了深刻的溢出效应，即便是自由派建制精英也越来越多地考虑收回国家主权，加强反自由国际主义的倾向，导致权力政治和国际竞争取代国际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而面对西方国家的保守攻势，其他国家也针对性地调整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和发展国内市场和区域主义，全球层面的发展合作面临新挑战。由此可见，新一轮保守主义思潮复兴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尤其强调身份政治、重视民族主义和国家精神，兼具右翼民粹

[1] 谢里·伯曼：《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李月军译，《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6期，第143-144页。

[2] Jack Snyder, "The Broken Bargain: How Nationalism Came Back,"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2, 2019, pp.54-60.

主义和保守国家主义的特征。

在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顾国际权力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而顽固并强硬地维系旧有权力格局和所谓“正统”国际秩序，在外交上采取了更具排他性和进攻性的举措。它们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视为严重威胁，频繁使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等标签，强调世界正处于“民主与独裁系统性竞争的时期”，从而将国际竞争“泛意识形态化”，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2022 年，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妄称，中国和俄罗斯“将独裁治理纳入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广大民主国家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1]兰德公司在其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将可能按照“改革既有秩序、创造平行模式或创建新秩序”三种竞争轨迹来扭转与西方的权力平衡。^[2]总之，西方舆论充斥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主张西方国家应做足准备，从而在“大国战略竞争可能导致世界再次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自身优势。^[3]

综上所述，当前新一轮保守主义以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国家主义的形式回归，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组建价值观联盟，挑动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强化国际竞争、对抗和冲突的倾向，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三、多边主义陷入话语竞争， 国际旧秩序与新规则平行共存

多边主义是人类应对共同挑战和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今天，加强多边主义，不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p.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2] Stephen Watts et al., “Alternative Worldviews: Understanding Potential Trajectories of Great-Power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CA: RAND Corporation, 2020, pp.14-15,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982.html.

[3] Legvold Robert, “Two Cold Wars in a New Bipolar World,”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22, pp.22-3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wo-cold-wars-new-bipolar-world-204553/>.

是一个选项，而是一种必需。多边主义通常是指“一种基于普遍的行为原则来调节三个或以上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具有普遍的行为原则、行动的“不可分割性”和“扩散的互惠性”等特征。^[1]

二战后，美国凭借自身的超强实力，将多边主义作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构建了一套基于自身经验和立场的西方多边主义话语体系，并主导建立了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西方多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的反映。它基于个体自由的价值观，秉持开放、基于规则、协商同意的原则，借助一系列多边安排来最大程度地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内部社会撕裂与外部非西方世界崛起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将多边主义视为损害自身利益的重要源头，采取了与多边主义原则渐行渐远的政策举措。美国在特朗普 1.0 时期更是公开破坏甚至抛弃多边主义，退出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及机制，其行为不但扰乱了世界，也孤立了自己。鉴于此，拜登政府执政后宣布美国“回归多边主义”，并努力重振“多边主义”：一方面积极修复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加强民主国家间合作，打造“俱乐部式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针对特定的突发事件和变化的利益群体采取“灵活的多边主义”，建立和丰富各种多边合作关系，并提出要用“跨越不同的地区和发展阶段的广泛联盟影响联合国和其他普遍制度的工作”，包括敦促联合国相关机构进行改革。^[2]总的来看，美国的新多边主义旨在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它更加关注“本国利益、相互依赖武器化和共同价值观”^[3]，体现出明显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严重违背了

[1]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0-12.

[2] Stewart Patrick, “Four Contending US Approaches to Multilateralism,” Carnegie’s Global Order and Institutions Program, January 2023, pp.26-2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01/four-contending-us-approaches-to-multilateralism?lang=en>.

[3] Amrita Narlikar, “Emerging Narratives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April 22, 2021, <https://www.globalpolicyjournal.com/blog/22/04/2021/emerging-narratives-and-future-multilateralism#:~:text=Amrita%20Narlikar%20explores%20the%20advantages%20and%20disadvantages%20of,to%20restructure%20-%20on%20the%20future%20of%20multilateralism>.

多边主义精神。

同时，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也提出了不同的多边主义概念及主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建设网络化和包容性的 21 世纪的多边主义”，主张要使各行业、各地域的全球机构（从开发银行到区域组织和贸易联盟）都彼此相连，也要利用民间社会、地区和城市、企业、基金会以及学术和科学机构的能力不断扩大参与圈。欧盟作为多边主义的产物和自诩的“多边主义领导者”，在 2021 年 2 月发布的《加强欧盟对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的贡献》报告中强调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公平性和服务欧盟及全球的利益与价值的结果导向。^[1] 欧盟在 2022 年 9 月发布的《重建多边主义议程》中再次强调，要致力于建设适合 21 世纪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印度提出了“改革的多边主义”概念。莫迪总理指出，相互关联的世界需要的是反映当今现实、让所有利益攸关方都有发言权、应对当代挑战并注重人类福祉的改革的多边主义。^[2] 中国提出了“真正的多边主义”概念，强调“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3] 主张“真正的多边主义”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4]

国际上出现的各种多边主义概念及主张，使多边主义既陷入一种话语竞争也面临制度上的博弈。对多边主义定义权的争夺，事实上也是在争夺塑造国际规则的权力，这已经构成了当前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了多边主义的定义权，构建了以多边主义为基本

[1]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European Commission, February 21,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n_strategy_on_strengthening_the_eus_contribution_to_rules-based_multilateralism.pdf.

[2] “PM Modi Calls for ‘Reformed Multilateralism’ to Reflect Global Realities,” Hindustan Times, January 27, 2022,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pm-modi-calls-for-reformed-multilateralism-to-reflect-global-realities/story-vnio0kum4WFnasQBGMH1N.html>.

[3] 《习近平分别会见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3 日，第 1 版。

[4]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26 日，第 2 版。

特征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使之呈现“后殖民统治、双重标准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等特点^[1]。如今，面对新形势，西方国家带头破坏其倡导和坚持的多边主义，加剧了一系列多边制度的功能弱化，从而使西方多边主义陷入严重困境。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努力倡导并践行新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某些议题领域中新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旧秩序与新规则平行共存。例如，在全球发展领域，由西方主导的依托发达国家“单向赠予”、体现为一种霸权供给模式的国际发展援助，^[2]因其更多地从援助国自身利益偏好出发而忽视了受援国的真实关切，在实践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相较之下，由新兴国家创建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采取将援助、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市场化融资方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域公共产品，^[3]塑造了更加注重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新型发展模式和治理路径，从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

由此可见，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针对“世界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多边主义”问题，国际上存在不同的声音和主张。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在积极倡导各自的多边主义，以塑造更符合其预期的国际秩序。所以，多边主义话语的竞争也是国际旧秩序和新规则之间的博弈，其竞争与博弈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新的国际秩序。

四、全球议题“泛安全化”，国际安全赤字加重

近年来，各种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了未来两年和十年内全球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错误和虚假信息、极端天气和地球系统关键变化、社会两极分化、国家间武装冲突、经济衰退、污染等。这些全球风险使人类发展取得的各项进步被缓慢削弱，并

[1] Tobias Bunde et al.,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Revision,”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2023, p.22,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3/>.

[2] 陈沐阳：《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载王正毅主编：《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82-483页。

[3] 曹德军：《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国际论坛》2024年第1期，第9-10页。

正在将地球适应能力推向极限。^[1]

全球性挑战的集中爆发，迫切需要加强全球性合作。然而，个别西方国家却以应对安全风险和挑战为由，泛化安全概念、模糊安全边界、渲染安全威胁，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过度安全化，将全球性挑战“泛安全化”，并为了追求自身“绝对安全”，打地缘博弈的“小算盘”，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进一步激化了全球安全的复杂紧张态势。^[2]近年来，美国随意以“国家安全”为由，将经贸、科技、人文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并对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进行干涉，不断制造安全风险。甚至有西方人士还将中国的发展模式渲染为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安全威胁”，在他们眼中，中国受益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强势崛起，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能够与西方模式相抗衡的“中国模式”，中国提出的国际倡议也被视为具有“促进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双重目的”，^[3]并存在“输出资本威权主义模式”之嫌。^[4]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21年的报告中预测，“未来二十年，全球影响力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达到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将会“继续支持反映各自核心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治理模式和国际体系，在多个领域展开广泛竞争”。^[5]一些西方人士不断升级由来已久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西方“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一些西方国家在制造安全风险的同时，又打着“去风险”的旗号，动辄诉诸单边制裁、“长臂管辖”、“脱钩断链”等极端手段，对目标国家进行制裁、

[1]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4,”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24, pp.6-11,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Global_Risks_Report_2024.pdf.

[2] 刘建超：《破解泛安全化困境 携手维护国际共同安全》，《当代世界》2024年第7期，第4页。

[3] Michael Bennon and Francis Fukuyama, “China’s Road to Ruin: The Real Toll of Beijing’s Belt and Road,” *Foreign Affairs*, Vol.102, No.5, 2023, pp.143-152.

[4] Tarun Chhabra, “The China Challenge,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Brookings, February 2019, pp.6-7,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china-challenge-democracy-and-u-s-grand-strategy/>.

[5] “Global Trends 2040: A More Contested World,”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rch 2021, pp.90-92, <https://www.dni.gov/index.php/gt2040-home/emerging-dynamics/international-dynamics>.

排挤和打压。2023年4月，欧盟和美国先后提出要以“去风险”为方针调整对华经济战略。同年5月，七国集团领导人日本广岛峰会发布公报指出，应“以多元化、合作深化与‘去风险’为基础实现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1]。在所谓“去风险”的名义下，部分西方国家在市场准入和供应链方面收紧对华限制，美国、荷兰强化了对华出口管制，美国持续收紧对部分中国网络企业的审查和禁令，少数美国议员还提出专门针对“敌对”国家科技公司的“限制法案”，借“去风险”对华经济霸凌。^[2]此外，他们也无端指责中国通过非市场政策严重破坏了经济竞争环境的公平性，^[3]提出必须“增强抵御来自中国经济胁迫的能力”以“应对中国扭曲全球经济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所带来的挑战”。^[4]他们还拒绝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性质，长期以“系统性侵犯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发起各种外交抵制。总之，一些西方国家意图泛化安全概念，渲染安全威胁，制造新的安全风险；同时，又打着“去风险”的旗号，大搞贸易限制，甚至“脱钩断链”，不仅给全球经济和科技合作带来困难，也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西方国家的“泛安全化”举措严重损害了国家间的理解与信任，使得彼此间隔阂猜忌增加，导致国际竞争升级和安全困境加剧。并且，“泛安全化”政策将本国安全凌驾于别国安全之上，挤压别国安全空间，以牺牲他国安全来追求本国自身“绝对安全”，也导致他国为了应对冲突与对抗而加大安全投入，从而使安全困境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2024财年，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国防投入，其中美国、日本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创历史新高，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也纷纷上调新年度国防开支。世界陷入“泛安全化陷阱”，进一

[1] The White House,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May 2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g7-hiroshima-leaders-communicue/>.

[2] Jin Junda, “Overemphasizing Security,” China Daily, July 14, 2023,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307/14/WS64b07093a31035260b8164cb.html>.

[3] 孙茹：《西方对华政策的嬗变——以七国集团为例》，《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5期，第42页。

[4] The White House,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May 20, 2023; Leonard Schütte, “Economics: Trade Off,” in Tobias Bunde, Sophie Eisentraut and Leonard Schütte eds.,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4: Lose-Lose?*, p.80.

步加剧了国际社会集团化阵营化对抗化态势，干扰了各国合作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努力，增加了“擦枪走火”引发对抗冲突的风险。这不仅严重破坏国际安全秩序，更使世界笼罩新的战争阴云。^[1] 西方国家盲目推行“泛安全化”政策，不但削弱了国际社会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而且也将造成自身战略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削弱保障本国关键领域安全的能力。

总之，“泛安全化”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过度安全化，将传统安全问题极端化，以对抗性思维而非合作性思维追求绝对安全，不但没有使世界更安全，反而使世界更加不安全。

五、国际思潮新动向下的中国外交

国际思潮新变化与世界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国际思潮的变化既是世界大变局的深层次反映，也深刻影响世界大变局的走向；而世界大变局既加剧了不同国际思潮的碰撞激荡，也孕育出更加多元的国际思潮。通常来看，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会以“诱致性”方式引起制度变迁并改变世界秩序，成为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主要动力源。^[2] 身处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既深受国际思潮的影响，也是塑造国际思潮的重要力量。国际思潮新动向给中国外交既带来严峻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着力提升对国际思潮的引领力，进而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变革方向。

（一）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引领国际思潮的发展走向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胸怀天下，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它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

[1] 刘建超：《破解泛安全化困境 携手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第 5 页。

[2] 杨光斌：《世界政治演变的动力与逻辑——关于世界政治学原理体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23 年第 9 期，第 70 页。

显示出强大的思想引领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顺应了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历史大势，是解决时代问题、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决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加重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主张以和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防止文明冲突，以生态建设呵护地球家园，为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崭新范式，也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是具有高度科学性的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2]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实践成果，展现出强大的实践伟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美好向往，汇聚了世界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共识，被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多边机制的决议或宣言，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线和崇高目标，从双边到

[1]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旗帜引领下胸怀天下，携手前行——王毅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3年9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309/t20230926_11150858.shtml。

[2]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卫生健康到网络、海洋，中国已经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领域构建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1] 通过构建双边、多边及不同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携手国际社会一道，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坚持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做出的战略选择。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塑造国际思潮的发展走向，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也彰显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二）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2] 在当前世界大变局下，国际旧观念与新思想的交锋与较量日趋激烈，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困境”不断升级，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在此形势下，中国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同时，新旧观念的较量结果也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甚至重塑国际社会的观念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在这场思想的较量中要敢于斗争，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在当前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中，西方国家不断以意识形态之名区别对待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来团结盟友，密集发起各类“民主国家同盟”，推行“价值观外交”，加剧与非西方国家的战略竞争。尤其随着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对“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具吸引力，不少西方人士偏执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8 日，第 3 版。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第 2 版。

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微妙的外交和意识形态挑战”。^[1] 尽管中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新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填补国际旧秩序缺口和完善现有国际体系的功能，也往往被旧秩序拥护者视为一种竞争或威胁^[2]，后者由此加大抵制力度，并通过组建新“议题联盟”来“推陈出新”^[3]。

大变局下国际思潮的较量带来的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中国反对将国际竞争意识形态化，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挑战，我们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对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有力的批驳，对污蔑和抹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进行坚决反击。中国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来不畏强权，不惧压力，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大国，中国勇担国际责任，在世界乱局变局中主持公道，在重大关键时刻担当作为，坚定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促进者，^[4]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协调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造福世界，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

改革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相互交织更为紧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联动

[1] “Should the US Pursue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Brookings, September 1, 2023,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hould-the-us-pursue-a-new-cold-war-with-china/>.

[2] 罗伯特·基欧汉：《竞争的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曲博译，《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21页。

[3] 许嫣然、曹司彬：《多边主义理论辨析与全球治理实践危机》，《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5期，第116-117页。

[4] 王毅：《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期，第16-22页。

更加频繁、密切。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要协调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更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在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形势下，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必须与全球治理统筹推进。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中国作为全球大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鲜明旗帜和崇高目标，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制度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当前日趋激烈的发展模式竞争体现的是根本制度间的竞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就要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同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全面参与并积极引领全球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建设，向世界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总之，世界大变局孕育大变革，而变革的力量往往从思想观念领域开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变量。面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国积极向世界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指明前进方向。

【责任编辑：肖莹莹】